

# 贗製還應重訂正

曾紀剛

## 說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

「天祿琳琅」是古代藏書史上最負盛名的皇家善本特藏，其內容精善，誠屬空前；盛極而遽燬，更教人痛惜。唯當時精心編撰之《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蘊含豐厚的文物資訊、鑑別法則與考訂論證，猶且沾溉學林；後人亦僅能從鈐有乾隆璽印而不見書目登載的目外之書，遙想昭仁殿上的藏書盛景。本文藉由一紙原本夾附書冊中的查驗摺片，與一方殘留於副葉和書葉內襯的印跡，論證目前存世的乾隆朝目外書中，確有因「撤出」而未獲著錄者。至於原先入藏「天祿琳琅」的善本，為何遭到撤出？撤出之後，將如何安置處分？乾隆皇帝又是如何在去、取之間延續書香空間，並展露其獨到的收藏見解與機緣？且讓文物現身說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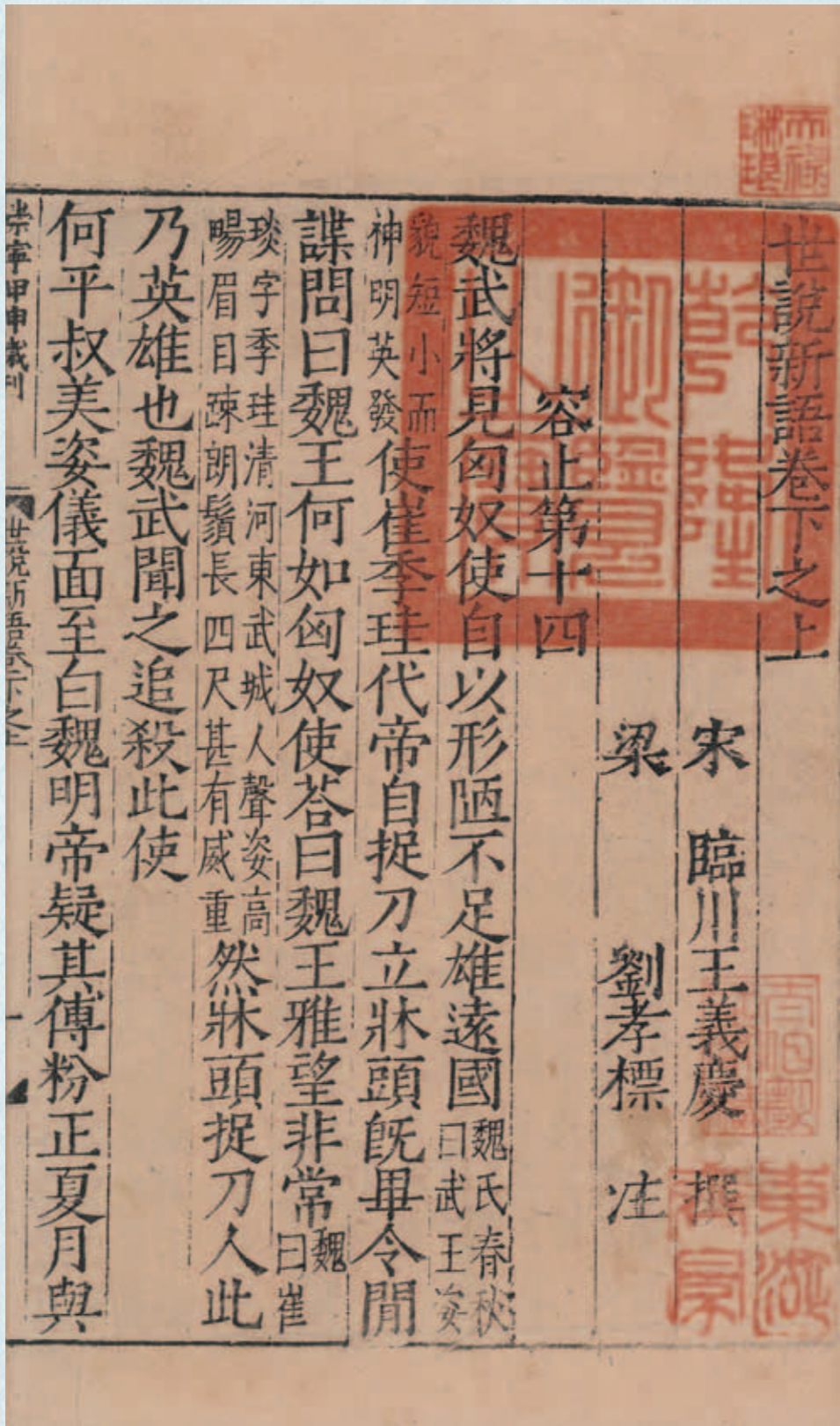
### 天府書藏 斯極盛矣

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三十  
四歲的乾隆皇帝在啓動編撰《秘殿珠  
林》、《石渠寶笈》後不久，便將蒐  
羅匯總紫禁城內各宮殿存藏古物並詳  
加考訂編目的視野，從釋道經卷、翰  
墨名蹟，延伸至古籍善本，敕命查檢

內府所貯之歷代舊版佳刻，擇定於昭  
仁殿列架庋置，建立古代書史上第一  
座以版本賞鑑為核心的皇家善本特  
藏——「天祿琳琅」。

昭仁殿位居紫禁城乾清宮東側，  
曾是康熙皇帝日常起居所在。乾隆即  
位之後，便不再以此為寢宮，而是將

累世相傳的嫺嫺秘笈匯聚殿內，意承  
漢代嘗建天祿閣藏書典故，又譬若彩  
玉滿室般光耀奪目，欲藉紙墨書香緬  
懷先祖，並以崇文稽古敬惕自勵，  
非徒慕風雅玩物之虛榮。自乾隆九年  
起，陸續有數百部圖籍，經由檢閱、  
擇善、進呈、覽定而成為殿中珍藏，



世說新語 明嘉靖14年（1535）裴裝嘉趣堂翻刊宋本 書口有木戳蓋印「崇寧甲申歲刊」字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晉 杜預撰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郡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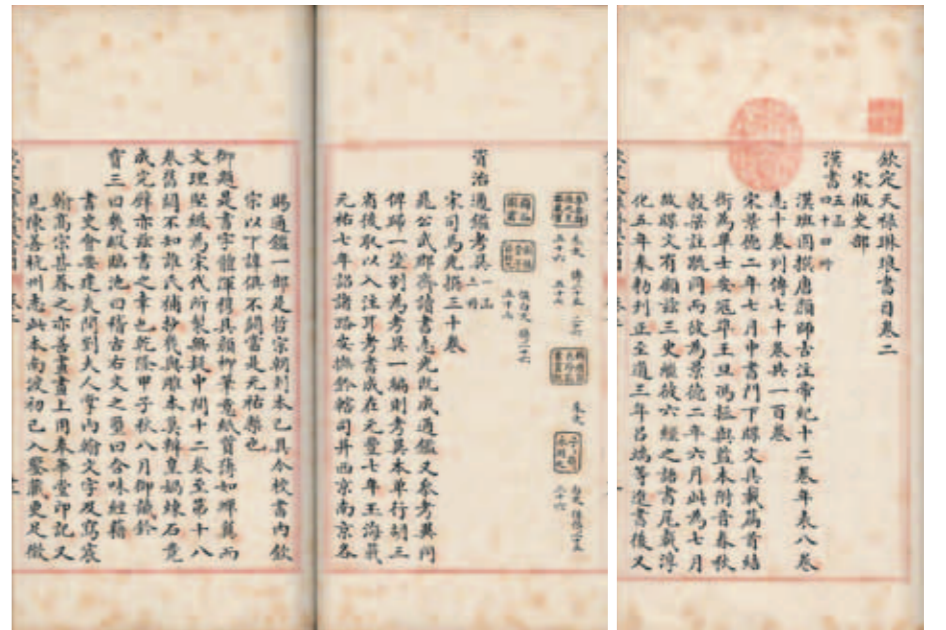
圖三 世說新語 明嘉靖14年(1535) 袁嘉慶堂翻刊宋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小方印：嘉慶朝重輯之書，首、末葉「乾隆御覽之寶」改為朱文橢圓印，並加蓋「天祿繼鑑」白文方印，前、後副葉另鈐「五福五代堂寶」（或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方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以後所製的朱文璽印。（圖二）

每一部書，皆予以仔細修補並重新裝幀。另有三十八部善本先後得獲乾隆御筆題記，甚至寫繪聖容，冠於卷首，除揭示其珍稀罕覓的歷史文物內涵，亦體現乾隆皇帝沉潛典籍的學術省思與賞鑑心得。

「天祿琳琅」藏書既精且富，



圖一 清 于敏中等奉敕編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曾輯有書目十二卷。（註一）伴隨《四庫全書》纂修工程的展開與需要，乾隆再度指示廷臣查考昭仁殿善本暨著錄實況，遂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由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七九）等人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以下簡稱《書目前編》）十卷（圖一），先按宋、金、元、明等版本時代分綱，再以經、史、子、集四部序次；各書皆附解題一篇，詳實考述其撰著背景、篇目序跋、刊刻源流與遞藏跡緒。原書鑑藏印記，則描摹原印形制並附楷書釋文，分別刻製木章鈐蓋於解題之後，再註明印色與卷次，實為古今藏書目錄之創舉。此編總共臚列四二九部書籍，無一不是縹緇精品。

府善本以恢復舊觀，僅費時七個月，便完成修築、選書、裝潢、編目、入藏等一系列工作，由工部尚書彭元瑞（一七三一～一八〇三）等編成《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以下簡稱《書目後編》）二十卷，再度著錄六六四部祕笈。彭元瑞且在識語中誇稱此番新藏之書，無論質與量，皆更勝前朝，「絕無翻雕贗刻，為坊肆書賈及好事家所偽託者」。（註二）但學者已明確指出，就現存嘉慶朝「天祿琳琅」書之實際版本年代與書目著錄相較，《書目後編》「誤判比例高達三分之一，而宋元版部分更是幾近三分之二」。（註三）則彼時昭仁殿藏書之精善程度乃至廷臣為迎合君心所費之網繆，或不難揣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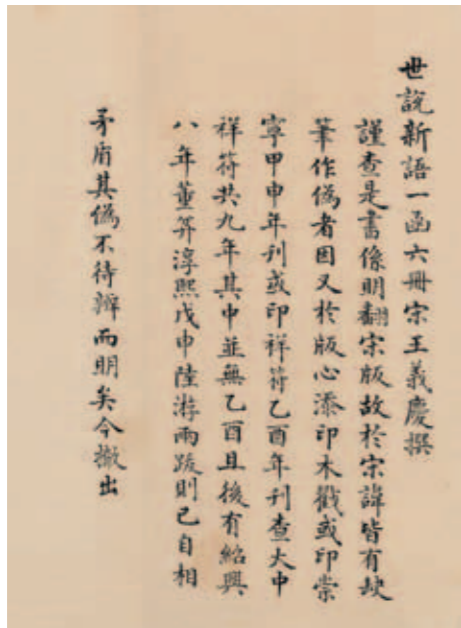
然而，這批歷經三十載蒐羅匯藏的珍貴善本，似乎並未得到天地的庇祐護持。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十月二十一日黃昏，乾清宮遽發大火，弘德、昭仁二殿皆成灰燼，「天祿琳琅」亦盡數焚燬，無一倖存。為彌補、平復太上皇的損失與創痛，嘉慶皇帝隨即下令重建昭仁殿並續輯內

他宮廷鑑藏文物一樣，兼具「皇家特藏」與「專供御覽」的獨特身分，每部書皆帶有鮮明醒目的鈐印特徵，成為後人辨識、考證、品賞與收藏的重要依據：乾隆年間入藏昭仁殿者，每冊首、末葉皆鈐有「乾隆御覽之寶」關邊朱文大方印與「天祿琳琅」朱文

唯昔日皇家舊藏傳存至今，卻有若干鈐蓋方形闊邊或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以及「天祿繼鑑」各璽之書，不見於書目著錄。這些書籍，即所謂「天祿琳琅」特藏之「目外書」。學者嘗析論其成因，不外「選餘」與「續入」二端：乾隆時期薈萃於昭仁殿之歷朝善本眾多，卒因殘缺或漏檢而未登載於《書目前編》，故成「選餘」之遺珠；前後二編書目編定後，皆有新獲佳槧陸續入藏，以備來日續編採錄，遂有「續入」之珍籍。（註四）今謹據本院典藏「天祿琳琅」相關書籍之實證，嘗試提出致生「目外書」的另一要因：「撤出」，並析述圖書撤出在乾隆皇帝擘畫善本收藏格局中的不同作用與意義。

明刊《世說新語》撤出實證

本院收藏四部鈐有方形闊邊「乾隆御覽之寶」暨「天祿琳琅」雙璽，卻未著錄於《書目前編》的目外善本。其中一部明版《世說新語》（圖三）最是特別，不僅保留書籍於乾隆



圖六 明嘉慶堂本《世說新語》檢校撤出摺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卷中之下補刊葉暨書口刻印之「祥符乙酉年刊」字樣



圖四 書口以木戳添印「祥符乙酉年刊」字樣

世說新語一函六冊宋王義慶撰  
謹查是書係明翻宋版故於宋諱皆有缺  
筆作偽者因又於版心添印木戳或印崇  
寧甲申年刊或印祥符乙酉年刊查大中  
祥符共九年其中並無乙酉且後有紹興  
八年董弁淳熙戊申陸游兩跋則已自相  
矛盾其偽不待辨而明矣今撤出

年間獲選入藏昭仁殿時重予裝褙的款式樣貌，更從其中發掘出此書後來遭到撤出「天祿琳琅」的文獻實證。  
這部三卷本《世說新語》，為南朝劉宋臨川王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編撰、梁劉孝標（四六二～五二一）所注，分為三十六門，從傳世典籍中纂輯人物言行與軼聞故事共千餘則，特別是魏晉名士之才調風流、清辭雋語，可謂盡萃於斯。書有六冊，高二六·三公分、寬一七·六公分，版框半葉高二〇公分、寬一四·七公分。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亦二十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雙魚尾，尾間刻「世說新語卷」幾，下記葉次，版心下偶見刻工名氏：李安（或作：安）、王、宗、周沓、華、綬、仲、起溟、仁、張。書中凡遇匡、胤、玄、弦、滋、眩、朗、敬、竟、鏡、境、弘、殷、恒、禎、貞、慎、徵、樹、讓、勗、桓、完、慎、敦等字，或缺筆以避宋帝名諱。目錄後附宋人高似孫（一一五八～一二三一）《緯略》之語，卷末另有識跋二篇，各署

孝宗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陸游（一一二五～一二〇）重刻之題識？其次，大中祥符年自戊申（一〇〇八）以迄丙辰（一一〇六），其間並無乙酉。再看書口印跡前後濃淡參差，復與書葉墨色不一致，實係另行刻製木戳逐葉添蓋。凡此種種，當屬坊肆商賈等有心人刻意變造以贗充宋槧之慣使伎倆。有趣的是，卷中之下第三十四葉（圖五），版刻字體與全書略有不同，所用印紙也更顯薄細，「敬」字不缺筆，當為補刊，唯書口同樣刻上「祥符乙酉年刊」而非戳印。檢視葉面小字注文，除原有劉孝標之注解外，居然可見「李贄曰」、「王思任曰」、「王世貞曰」等語，推斷此葉必是晚近坊賈所增入，竟猶規仿前後書口戳印刻上北宋年號，可謂輕妄甚矣。  
更有意義的發現，乃在存放此書之櫃架中，留存一紙摺片，縱二一·二公分、橫二一·四公分，正楷墨書七行、一百三字。經比對所述內容，確定原應隨附此書內，現逐錄於下：  
（圖六）

「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弁題」與「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略記版本特色以及刊印原委。書中除「天祿琳琅」各璽之外，尚可見「東湖世家」朱方、「太伯鄒氏家藏」朱長、「澹園居士」白方等收藏印記。書冊外覆月白色曲水紋地纏枝暗花緞面書衣，牙黃絹質書籤，黃綢包角，裝幀古雅別緻；全書未有再經修補的痕跡，當即乾隆年間初次經由內府重新裝潢後入藏「天祿琳琅」之舊貌，實屬難得。據民國十四至十九年（一九二五～一九三〇）「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這部書最後安置在惇本殿內帶芙蓉紗簾的樟木書架上。  
此帙獨有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每葉書口皆有「崇寧甲申歲刊」或「祥符乙酉年刊」字樣。（圖四）案「大中祥符」與「崇寧」係北宋真宗、徽宗所用年號，莫非該書是為宋版、甚至是珍稀逾常的北宋刊本？由此反例別啟疑竇：北宋時期刻梓之書籍，如何能有南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董弁所撰跋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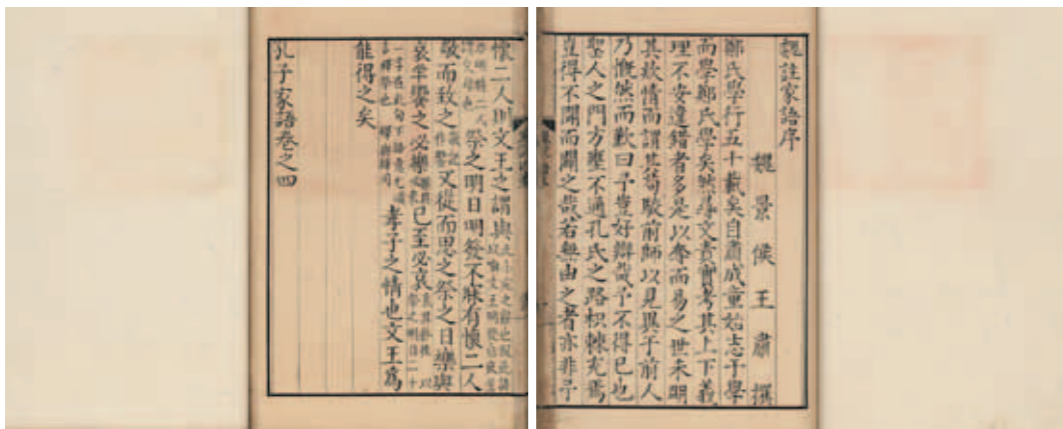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一函六冊，宋王義慶撰。謹查是書係明翻宋版，故於宋諱皆有缺筆。作偽者因又於版心添印木戳，或印「崇寧甲申年刊」，或印「祥符乙酉年刊」。查大中祥符共九年，其中並無乙酉，且後有紹興八年董弁、淳熙戊申陸游兩跋，則已自相矛盾，其偽不待辨而自明矣。今撤出。  
當中列舉若干確可考見之偽冒跡證，審定其版本實為明人據宋本翻刻，遂予以「撤出」處分。所謂「撤出」，自是從昭仁殿「天祿琳琅」特藏中撤出，且原本著錄於「宋版子部」，一旦揭露真實身分，竟也不容改列「明版子部」目中；遭到撤出的原因，顯係版本造假而為檢校廷臣覺察揭露；撤出時間，應在乾隆三十九年仲夏過後重校補葺《書目前編》之際。據此查覈摺片，足資說明這部未經書目著錄之《世說新語》，得以明確界定為乾隆朝天祿琳琅「撤出書」。

既經撤除著錄，嘉慶二年重建昭仁殿並續輯《書目後編》時，亦未再收斯帙，而改列另一同版印本，



圖八 梁 蕭統編 唐 李善等六臣注 六家文選 右：宋紹熙慶元間（1190-1201）廣都裴氏刊配補明表裴嘉 趙堂覆裴氏本 左：明嘉靖13至28年（1534-1549）袁裝嘉趙堂覆刊宋廣都裴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四九六～一五七六）增補讎校、隆慶六年（一五七二）門人徐祚錫刻梓於長洲（江蘇蘇州）的版本。其一原貯紫禁城景陽宮靜觀齋，另一部則是前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曾為清中葉金石鑑藏家沈復燾（一七七九～一八五〇）「鳴野山房」故物。前者儘管內頁不見任何乾隆璽印，書冊亦



圖九 魏 王肅注 孔子家語 明隆慶6年（1572）徐祚錫長洲刊本 前後副葉及首末葉皆可見朱油滲漬的痕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已經過改裝，猶能說明其確為「天祿琳琅」撤出書，且遭受更為強烈的處置作為。

清宮舊藏之《孔子家語》，十冊，高二四·三公分、寬一六·四公分，版框半葉高一九公分、寬一二·九公分。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不等。左右雙欄，版心白口，單黑魚尾，尾下刻「家語」幾卷，下記葉次，版心下鐫刻工姓名：章右之（或作：吳門章右之、右之、長洲章右之刻、章右之刻）、章掖刻（或作：掖）、方瑞先（或作：方、方瑞先刻），為當時蘇州雕版之良工。前有王肅《魏註家語序》，次《每篇古文辯義總目》，次目錄，卷末附《孔安國傳略》。書中鈐有「天中」朱長、「慎齋」白方、「春」「齋」朱方、「汪中子永」白方等收藏印記。此帙乍看之下無任何「天祿琳琅」相關印記，唯各冊首、末半葉均被整齊裁去，再以原書之襯紙依原式鈔繕接補；儘管如此，仍舊明顯可見前後副葉以及首末葉皆透出方形闊邊大印朱油滲漬的痕跡，覈其尺寸與隱約之璽文，正是「乾隆御覽之寶」。（圖九）由此可見，乾隆年間嘗將有幸入



圖七 右：明嘉趙堂本《世說新語》卷末刊記 左：撤出書原刊記處經刻意裁切

趣堂重雕」刊記（圖七），恰為食慕榮利者特意抽除、裁補之處，也正是後人判別版本的關鍵憑據。故此二部《世說新語》，同為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袁裝嘉趙堂翻刊宋本。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出版界盛行一股翻刻宋版書的風氣，以蘇州地區所刊行者，最稱精工，具體反映當時文化界「好古」的品味風尚，而袁裝（一四九五～一五七三）「嘉趙堂」則堪稱箇中之佼佼者。裝字尚之，吳縣（今屬江蘇省蘇州市）人。博學善屬文，兼擅詩、書、畫，卻累試不第，遂專意汲古以自娛。晚年躬耕謝湖之上，自號「謝湖」。明末詩壇領袖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列朝詩集小傳》言其「藏宋刻書，裝潢讎勘，並稱善本，摹刻行世，士林重之」。（《丁集中》）可見袁裝藏書與刻書的特色。清末蘇州文獻學家葉昌熾（一八四九～一九一七）《藏書記事詩》且謂：

江左清談擅籍成，選樓更繫五臣銜。兩書已足沾來學，九百康初大可芟。所指正是袁氏嘉趙堂據宋本鐫梓之

《世說新語》，以及翻雕自宋廣都裴氏刊本、費時十六年始刻竣之《六家文選》。（圖八）不僅紙墨絕佳、寫鏤精好，書籍本身即頗富收藏價值；其盡可能保留原刻面貌的製作方式，且令孤帙秘藏不致散逸湮沒，傳續學術血脈的意義更超越汲汲於衣食的商業考量。由於這些印造嚴謹的翻刻書常可亂真，輒招來不肖者取以變造，假冒古本，亦屬情理中事。今觀嘉慶朝新輯之《書目後編》號稱收得七部「廣都裴氏本」《六家文選》，便全為嘉趙堂所刊。

### 明刊《孔子家語》鈐印餘跡

《孔子家語》載錄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行事跡，也包含諸弟子自記與夫子相問答的豐富內容，對於研究孔子及其時代之歷史、制度、思想、信仰乃至語言文學，皆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三國時期魏國經學家王肅（一九五～二五六）之注，在各家注解中不僅文獻價值較高，傳刻版本也相對複雜。（註五）院藏二部明版王肅注《孔子家語》，同為明代畫家陸治



圖十一 清 清高宗撰 御製詩四集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當時纂修《四庫全書》影響，無論編輯實務或學術探賾，彼此皆密切相關。此外，回顧三十年來傾力經營昭仁殿善本特藏的歷程，乾隆似乎頗感於這些遭到撤出與新獲續入的書籍，在此之前未嘗得遇真正的知音，「笑咨適日抽增者」句下有注曰：

舊所辨宋版中，頗有未確今經訂正改撤者；亦有原辨疎漏今為考定增入者。（圖十一）

而在《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廣製還應重訂正」句下，亦注曰：

近因重校「天祿琳瑯」舊藏，凡偽充宋元槧印者，俱詳加別擇改正。可知《書目前編》編定之前，曾專就殿中度貯善本詳加考證，經查贗冒宋、元版者逕行撤出；前述嘉慶堂翻刊宋本《世說新語》即一實例，足證其所言非虛。倘若有舊編書目未及著錄或遺漏的珍罕秘笈，則謹予增補；乾隆三十九年在武英殿書庫中發現之宋廣東漕司本《九家集注杜詩》，誠屬最令人驚艷嘆美的絕世名槧。當年仲夏，乾隆《題郭知遠集九家注杜詩》「重以琳瑯續天祿」句下即注云：

「天祿琳瑯」惜早已成書，此本當為續入上等。

藉由前述《世說新語》、《孔子家語》二例，當能充分證實：乾隆年間建置「天祿琳瑯」的動態歷程中，「撤出」確為一系列典藏、檢校、編目作業之重要環節。「撤出書」的遺存與發現，復可適度說明：正因整比訂正工作之縝密、措施之嚴峻，所纂定之《書目前編》方得以更具體、真切地呈現昭仁殿上精醇美備的書藏勝

號，便能讓清朝君臣格外敏感。因此，廷臣特於「明嘉靖」三字旁黏貼黃箋予以標誌，（圖十）宛若斯帙務須撤出「天祿琳瑯」且奪其御寶、改換為尋常賤紙書衣之鐵證。

**品資檢校得求真**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正月初三，時值《書目前編》纂定後新春，乾隆皇帝循例於重華宮召集大學士及內廷翰林諸臣二十八人賜以茶宴，意喻合周天星宿之數；宴中君臣共製《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同讚「天祿琳瑯」珍儲圖籍之殷富美盛。乾隆是日賦得二律，其二云：

甲子琳瑯輯天祿，因之內殿度昭仁。三旬閱歲編維舊，四庫於今書奮新。體固參差置應別，品資檢校得求真。笑咨適日抽增者，豈之當時預選人。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五）

詩中除揭示專設「天祿琳瑯」奔藏內府善本之時間、地點，亦說明《書目前編》並非初輯，而是整合舊藏暨續入諸書並重新審訂之新編；新訂目錄的分類體例與版本考訂，復受



圖十 陸治按語中「明嘉靖」三字旁貼以黃箋標記

藏「天祿琳瑯」之善本撤出昭仁殿，其例誠不孤矣。

再取同版摹印之平館善本並觀互覈，即可看出這部《孔子家語》在入藏昭仁殿之前，已被特意抽除若干重要的元素：卷首孔安國《漢集家語序》並陸治識語，王鑿（一四五〇）《孔子家語題辭》，陸治《刻家語題辭》暨《考證凡例》十三則（註八）；卷末《古本孔子家語跋》（署「隆慶壬申仲夏望長洲後學徐祚錫謹識」），以及《附錄》。其用心不言可喻，即盡量剝削能夠辨識版刻時代的訊息特徵，淆惑眼目以抬高身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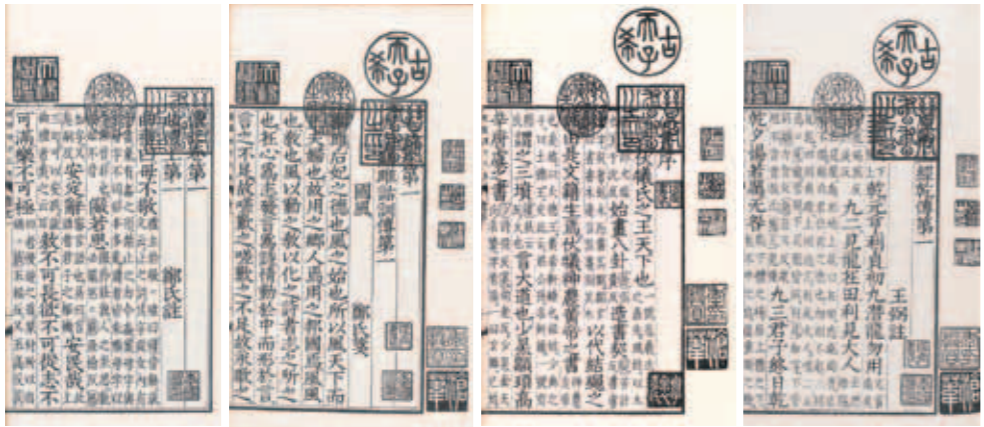
此書之所以遭到撤出，並嚴行拆除既鈐於書葉之璽印，或許仍是基於實際版本與原初審定（或期待）結果不符，甚至判若霄壤。而令檢校廷臣據以揭穿、推翻此書假冒古本之關鍵，當是卷十《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篇末陸治按語中所閃現的嘉靖年號，足證此本乃明代中後期所刊，自不若舊槧之可寶；姑且不論圖籍版刻之真偽輕重，單是前明帝諱年

景，並提供後人相對可靠的版本資訊與考辨、賞鑑之準據。

唯有明確實證，方得將目外善本論定為撤出書，其餘未經《書目前編》著錄者，當多屬「選餘」之書；又或乾隆四十年之前，即有部分書籍因種種緣故提調至別處後不曾歸還，尚且無緣參與檢校重訂的階段，故未能正式著錄於書目。這些目外之書，在確認其為選餘或撤出的身分狀態後，除了從舊編簿錄中勾銷其名，更有可能連帶移易書籍之貯存位置；歷經世事更替、帝祚移人，直至民國肇建，若干珍籍終究未再回到昭仁殿上。也正因如此，部分前編書目之目外書有幸免於嘉慶初年昭仁殿火劫，得以傳存至今。

**善本鑑藏的延伸**

然而，乾隆朝對「天祿琳瑯」善本施以「撤出」處置，並非取決於鑑別版本真偽的單一標準，或藉以貶抑文物價值，作為一種懲罰。在《書目前編》編定之前，「撤出」的用意自是為了解決贗刻，令所藏善本名實



圖十三 右起：武英殿影刊元相臺岳氏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之舉刻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晉 杜預撰 春秋經傳集解 清乾隆48年(1783)武英殿影刊元相臺岳氏本五經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套五經曾陳設於乾隆盤山行宮「靜寄山莊」

四十七年始得《周易》、《尚書》、《毛詩》，進而觸動聚合五經並設專室珍藏的念頭。可以肯定的是：《書目前編》編定後不久，乾隆即萌生續輯、擴編「天祿琳琅」之宏圖且付諸

行動；當書目輯成之後，倘若更有新獲續入之罕覓秘籍能與殿中善本相匹配、甚或自成一完整的典藏主題，礙於難再增補著錄，則「撤出」便成爲既豐富藏書內容、更展拓賞鑑空間

的權宜之舉。「五經萃室」的設置，即是匯集撤出與續入的貴重典籍，與「天祿琳琅」形成一種折衷於離合之間又各自獨立、相互輝映的特殊關係。

「五經萃室」是從「天祿琳琅」延伸至昭仁殿後西楹的一處別緻書室，專爲收藏元初相臺岳氏荆谿家塾所雕印的五經而設。（註七）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高宗喜獲明晉藩王府舊藏岳刻《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四經，讚其鑿校精審、寫刻工緻，即便宋版中之最佳者，亦不多見。由此想起昭仁殿內或藏有相臺本《春秋》，可以配全；一經查檢，果然早已登列於「天祿琳琅」。乾隆以爲「既分而合，幸合則不可使復分」，因而將《書目前編》著錄之荆谿家塾刊《春秋經傳集解》撤出，於昭仁殿後廡特闢「五經萃室」，與續入四經璧合珠聯，並重新裝潢書冊，遂令美富集成，匯貯於一室，「是舊者固不出昭仁殿，而新者亦弗闖入舊書中」。（《御製文二集》卷十四）對於這樣的安排，古稀

天子意頗自得，同時命武英殿依其原式影摹鑲版，務求逼肖原書，另取諸本詳加讎校，且「用仿宣紙三印而後成，楮墨精良，備宮庭陳設之用，並宣賜內外臣工，恩許印本通行」。（註八）正因乾隆諭令「複製」相臺五經並頒賜流播，故在昭仁殿與五經萃室藏書痛遭焚燬之後，世人尙得藉以揣想岳氏校勘之精、雕鑲之善。（圖十二）

從影刻五經所保留之鑿藏印記，或能進一步尋繹乾隆皇帝善本收藏的時程脈絡。《春秋》自「天祿琳琅」撤出，故有「乾隆御覽之寶」方形闊邊大印，其餘四經，俱已改爲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與「天祿繼鑑」方印，又唯獨《禮記》未見「古希天子」圓璽。（圖十三）乾隆《五經萃室記》嘗道：「丙申以後所獲之書，別棄於御花園之養性齋，以待續入。」意指《書目前編》既定，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後持續收得之善本，即已變更鈐印規制。據此推測：《禮記》應於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一七七九）間所獲，

最足欽慕樂道的身影與藝術遺產。「天祿琳琅」的建立，不僅成就這位十全天子豐贍浩博的文物收藏版圖中一道絢爛的景緻，更是古代藏書史上最令人痛惜的損失。如今，世人僅能藉由散藏海內外之《書目前編》目外善本，略窺昔日昭仁殿藏書的鈐印規制、版本特色等片斷光影，乃至於極少數完整保留下來的裝幀樣貌；從中發掘書籍遭撤出的文物實證，則有助於了解或推論藏書、編目與學術考證之間的互動關係，或可爲乾隆善本收藏活動補白一筆，進而領略其別具慧心的賞鑑品味。

乾隆皇帝終其一生，未嘗想見、遑論目睹帝國的落日，唯御極六十年間傾心學劃的文化工程，集珍薈萃的古物收藏，以及恣意揮灑的賞鑑品題，在走下歷史舞臺之後，盡成後人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見（清）于敏中等奉敕撰，《國朝宮史》，卷二十三。據書前進呈奏摺，此書纂成於乾隆三十四年歲末。
2. 見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王先謙《（一八四一）一九一七》長沙刊本卷末。
3.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頁四〇二。作者曾對可以考知之「天祿琳琅」存世善本進行全面調查，本書亦爲當今學界研究此一課題最具代表性的專門論著。
4. 詳見劉薈，《天祿琳琅研究》，頁一八七～一九九。
5. 可參考金鏡，《〈孔子家語〉版本源流考略》，《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二〇〇一，頁一六五～一〇一。

6. 陸治題辭、凡例及《孔安國傳略》未皆刻有「長洲顧樞寫／章振刻」。撤出本將《孔安國傳略》移置卷末，篇末半葉適被裁去，即未再補鈔寫刻人姓名。
7. 過往以爲「岳氏」即南宋名將岳飛之孫岳珂，故歷代藏家乃至乾隆君臣皆將此本定爲宋槧，珍視異常。後經學者考證，相臺岳氏荆谿家塾刊印九經、三傳，實與岳珂無涉，而是元初常州路義興（今江蘇宜興）人岳浚（字仲元，岳飛九世孫）家塾所爲。
8. 見（清）慶桂《（一七三七）一八一六》等奉敕撰，《國朝宮史續編》，卷三十三。據書前《進表》，此書於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八〇七年一月二十日）纂竣進呈。